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高瑾.《急就篇》中的儿童教育方法[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4(3):107-112.

《急就篇》中的儿童教育方法

高瑾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作为现存最早的童蒙识字教材,《急就篇》之所以能被保存至今,与其中蕴含的儿童教育方法有一定关系。这种教育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形式上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内容上接近儿童的日常生活,注重潜移默化的观念教育。唐代以后,《急就篇》与时代的距离逐渐凸显,最终让位于新的蒙学教材。

关键词:急就篇;识字;名物;儿童教育

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1)03-0107-06

一、《急就篇》的流传及研究现状

提到中国古代的识字教材,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其实,比它们更早的识字教材还有很多。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之前出现的识字课本有《史籀》《苍颉》《爰历》《博学》,汉代出现了《凡将篇》《元尚篇》《训纂篇》《急就篇》等,但是,其中有很多都已亡佚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学者指出,《急就篇》是“学吏者”的课本,而非“一般的启蒙教材”^[1],但要区分二者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文化教育尚不发达的古代,作这种精细的区分,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大量文献表明,《急就篇》确实曾用作普通的启蒙教材。张传官在《谈〈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一文中指出:

在西汉以后的六百多年间,《急就篇》作为启蒙教材风行一时。史游生活的年代,距西汉灭亡只有四五十年,而居延出土的西汉木简中就已经发现了《急就篇》文句。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此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首都传播到边疆,可见其流传速度之快。在河北等地发掘的东汉墓葬中,甚至出现了用《急就篇》文字与数

字、干支等一起给砖块编号的情况,可见当时人们对此编的熟悉程度。史籍中也屡见人们幼年学习《急就篇》的记载……而他们都不是学吏者或畴官子弟。凡此种种,以及魏晋书家如钟繇、卫夫人、王羲之多以《急就篇》为内容进行书法创作等情况,均可以说明《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使用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学吏者。^[2]

《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汉书·艺文志》记载:“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3](P89)}此说被学界广泛认可。唐太宗年间,颜师古痛感《急就篇》在流传过程中错讹太多,而这种错讹的版本却流传甚广,“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袭,犹竞习之”^[4],继承其父颜思鲁的遗志,参考书家、注家的各种版本,为《急就篇》作注。南宋时,王应麟又为颜师古的注本补注。顾炎武也提到《急就篇》的广泛流传,“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学渐微。”^{[5](P1184~1185)}由此可见《急就篇》作为一本蒙学教材的巨大影响。

《急就篇》今本全篇有34章,共2144字。古人对《急就篇》的研究集中在版本、文字的考辨上。南宋罗愿考证指出:

此书旧分三十二章,前代能书者多以草书

收稿日期:2021-03-1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三种形态研究”(2019BWX025);郑州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外国文学史课程过程性评价研究与实践”

作者简介:高瑾(1977—),女,河南新安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儿童文学研究。

写之。今世有一本,相传是吴皇象写,比颜解本无“焦灭胡”以下六十三字,又颇多讹脱。颜本不分章,象所写三十一章而已。国朝至道中,太宗皇帝尝亲书此篇,又于颜本外多“齐国给献”以下百二十八字,凡为章三十有四。此两章盖起于后汉。^{[4](P326~327)}

罗愿认为,《急就篇》最后两章是后人增补的,这一考证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近代以来,《急就篇》版本研究、文字考辨成果最为丰富。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急就篇》的成果也有,但为数不多。20世纪60年代,张志公在研究传统语文教育时,把《急就篇》作为“集中识字教材”加以介绍,指出其优点是“尽可能避免重复字”“在识字教育中多少教给儿童一些常识”“字数适当”^{[6](P12~13)}。沈元在《〈急就篇〉研究》中分析了《急就篇》反映的汉代社会生活,尤其是阶级关系,也谈到了《急就篇》的蒙学教育观念以及语言形式特点。他认为,《急就篇》对“知识技能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直接的训诫”相对较少。^[7]但是,其对《急就篇》的蒙学教育思想的分析多从阶级批判入手,而对《急就篇》的价值阐述不够。曾仲珊总结了《急就篇》的6个特点:集中识字、整齐押韵、注重实用、知识面宽、注重思想教育、读写结合。^{[4](P397~400)}这种简明扼要的概括固然显得清晰,但是呈现出来的信息毕竟有限。只有在详细的描述中,《急就篇》潜在的教育观念才能得到深入细致的揭示。喻岳衡在曾仲珊校点的《急就篇·前言》中写道:“一本儿童识字课本,在两千年后还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在世界教育史和文化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应该说主要在于书本身。”^{[4](P8)}《急就篇》之所以能够被保存至今,除了在书法领域有众多的写本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内容和形式为后来的识字教材确立了一个基本格局,其中潜在的儿童教育观念也得到了古代读书人的普遍认可。

二、形式上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

识字教育是儿童教育当中非常重要、非常困难的一个环节。从说话到认字,儿童必须在鲜活的声音与抽象的符号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有些符号表达的意思也不是直观的、具体的,比如姓氏,这时候死记硬背就成为识字教育中不得不用手段。而整齐押韵的语言对儿童记诵很有帮助。采用韵语来编写蒙学课本,是古代蒙书共有的特点之一。《急就篇》是现存的最早范本。但是,与“基本上为官府所

承认,编法也比较雅驯”^{[6](P29)}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相比,《急就篇》的句式更丰富。开头用七言说明该书的价值,用一句四言“请道其章”做过渡;接着用三言介绍姓氏、名字,加上两句过渡语,总计402字;介绍名物、五官,用七言;为汉帝国歌功颂德的63字,主要用四言(56字是四言,最后用7字单独成句收尾)。而《三字经》是单纯的三言,《百家姓》《千字文》则是单纯的四言。《急就篇》选择不同的句式表达不同的内容,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此外,三言、四言、七言等不同句式的转换,使得《急就篇》在形式上更加活泼多变,易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

《急就篇》中的四言句,从内容上看接近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赞”。“赞”这种文体一般使用四言句,“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8](P58)}。在汉代,由于对儒学的尊崇,《诗经》被奉为经典,四言诗仍是当时常见的一种诗歌形式。《急就篇》中的四言部分多为颂言,可见作者在选择句式时注意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让儿童在接受识字教育时也学习基本的诗歌常识。

三言句主要描述名、姓、字。王应麟在为“罗列诸物名姓字”补注时说:“名、姓、字,皆谓人也。子生三月,父名之”,并引《礼记·曲礼》中的“男子二十冠而字”和《仪礼·士冠礼》中的“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两句,以辨析名与字的差别。^{[4](P33)}其实,《急就篇》并没有严格地区分名和字。《急就篇》罗列的第一个名字“延年”是名,这在《汉书》中有佐证。《汉书·酷吏传》有“田延年字子宾”“严延年字次卿”的介绍。罗列的第二个名字“子方”则是字。“子”是古人表字中常用的衬字。《庄子·外篇》《史记》中均有“田子方”的介绍。王应麟在补注中也认可“子方”是表字:“魏有田子方,名无择。”^{[4](P37)}“逢时”“温舒”是名。《汉书》记载:“路温舒字长君。”而“仲郎”“伯徐”则是表字,王应麟补注“侯仲郎”“孟伯徐”时,都曾举后汉人表字为例。单姓和复姓在《急就篇》中也没有分开罗列。《急就篇》中的复姓有“令狐”“公孙”“司马”,复姓后的名字为单字。

秦汉之时,一个字的名多于两个字的名,这在《史记》《汉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表字只有一个字的也不少,如《史记》中项籍字羽,刘邦字季。《汉书》中陈胜字涉,吴广字叔;还有名是两个字,而表字只有一个字的,如郑当时字庄。但很多人的名是一个字,表字是两个字。如《汉书》中刘向字子政,刘歆字子骏,张良字子房,汲黯字长孺等。在西汉的这种文

化传统中,《急就篇》在介绍姓名的时候,大量选择单姓和双字名或表字组合,构成三字句,而没有用单名单姓组成四字句,是出于何种原因呢?笔者以为:第一,两个字的名字能够表达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儿童在识字的同时,也在熟悉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如延年益寿的愿望、雅词美词的偏爱、建功立业的渴望以及道德标准,这样更便于儿童学习,即便是“弃奴”这样的贱名,也寄托了长辈的美好愿望;第二,三字句是汉代民谣常用的句式,简洁明快,为儿童所熟悉。有学者指出:三言体“这种节奏读起来节拍感很强,便于在快节奏中记诵,所以最易为民谣儿歌所接受。流传至今的《三字经》,之所以用三言句式来作儿童启蒙教育,正是基于这一道理”^[9]。

《急就篇》中的七言句占据篇幅最大,且均由实字组成,是比较早的七言体韵文。有学者认为,《史籀篇》《仓颉篇》皆为四言体,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篇》的出现,是因为“七言歌谣必已流行”,大量采用七言是“为了便利流俗”。^{[10](P146)}也有学者指出,《凡将篇》《急就篇》这些早期的七言体韵文无需“句意连贯”,只要罗列文字、名物即可。^[11]《急就篇》多为七言句,和当时字书多为七言的传统有关。但是《急就篇》的七言句并非全在罗列名物,也表达了作者的观念和评价。即便是以罗列名物为主的七言句,也常常有“离云爵”这样的描述,“不值钱”这样的评价,还有“完坚耐事踰比伦”这样的评价性句子插入。可见《急就篇》选择七言句,一方面是便于罗列名物,另一方面是为了表达更丰富的意义。

综上所述,《急就篇》无论是选用四言句、三言句,还是七言句,都是为了使表达的内容与形式更好地统一起来,让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儿童识字更有趣,也更有效率。

《急就篇》的篇幅适宜,非常适于儿童识字。清代王筠认为:“能识两千字,乃可读书。”^{[12](P1)}按照这一理念,他编了一本《文字蒙求》,分为四卷,卷一为象形字,卷二为指事字,卷三为会意字,卷四为形声字。张志公统计,《文字蒙求》共收录 2044 个字。张志公还提出另外一个佐证:“当代用很科学的方法统计,制订出一个依出现频率排列的字表,发现前 2000 字大体能覆盖现代普通读物用字的 70% 左右。”^{[6](P36)}王筠生活在清朝后期,依据其学识经验得出识 2000 字“可读书”的结论。张志公则依据现代统计学得出了相似的观点。可见,2000 字是识字教育中非常重要的节点。而《急就篇》除去后人补的两章,总计 1616 字。南宋罗愿指出,皇象本无第 7 章。

王国维则根据出土汉简上的《急就篇》章序,结合韵脚和内容推断第 7 章“为后人所补”。^{[4](P349)}不少研究者支持这一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原书只有 31 章,1953 个字,但学界对此尚有争议。虽然第 7 章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如重复字较多,就连“尚”“乐”两姓也跟前面列举的姓重复了,但颜师古参照的版本比后人更多,在出土文献不能提供更有力的证据之前,他补入的第 7 章不能被轻易否定。有学者统计,除去重复字,《急就篇》31 章共收字 1649 个。^[13]如果加上第 7 章,除去重复字,《急就篇》32 章收字接近 1700 个。对于一本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启蒙识字教材而言,这一数量是非常合适的。《汉书·艺文志》记载:

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3](P95)}

据此可知,《仓颉篇》有 3300 字。扬雄、班固在此基础上继续增补,他们的书字数只会越来越多,成为专业字书,失去作为蒙学识字教材的功能。张志公认为,《仓颉篇》《训纂篇》失传,跟这些书的字数太多是有一定关系的。^{[6](P13)}

另外,《急就篇》按章编排,分章节学习,循序渐进。《急就篇》每章一般是 63 字(个别杂言章节是 64 字)。关于这种划分方法,颜师古在《急就章注》中指出:“每标章首,以字数为断者,盖取其程课学僮,简牍为便也,是以前之卒章或与后句相蹶。”^{[4](P31)}这种划分方式有利于合理安排教学进度,符合儿童天性活泼、求知欲强但定性不足的特点。

三、内容上接近儿童的日常生活

集中识字是中国古代儿童识字的常用方法,但是,如何集中识字却有不同的路径。清代王筠主张认字与讲解结合,先易后难,先教“象形、指事之纯体”字,如“日”“月”“上”“下”;“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难讲者。讲又不必尽说正义,但须说入童子之耳”。^{[12](P1)}这是一种比较纯粹的集中识字法,按照字的难易程度循序渐进,关注单个字的教学,伴以老师的讲解。他编写的《文字蒙求》就是这种识字方法的体现。

《急就篇》倡导的识字教学方法不一样,从总体

上看,《急就篇》的编者注重以文化意蕴串联应识之字,将生活经验与识字教学结合起来。

姓名是确认自我和他人的符号,是儿童人际交往中的常用符号。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名字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自然需要,因此,通过认识名字来识字是非常有效的方法。算上第7章,《急就篇》中共罗列名字132个。前人在研究这些内容时,多从西汉社会文化的角度解读名字中潜藏的黄老思想、道德期许以及建功立业的渴望。^[14]也有人考察《急就篇》中列举的姓的数量。王应麟在注释中多次提到《急就篇》列举的名和字中也有很多姓,如“吕张”“魏唐”“杜杨”“李桑”等。万光泰甚至认为:“史氏必皆姓名兼举。”^{[15](P143)}但是,《急就篇》列举姓名的主要目的是便于儿童识字。只有从识字教育的角度出发,才能更好地把握该书编写者的意图。认识人名只是激发儿童学习兴趣的一种手段,所以识字教材中的名字或者姓不能太多。王应麟编写的《姓氏急就篇》中姓氏多达2000多个,这种书不可能在蒙学教育中流行。《百家姓》是一本比较好的识字教材,但是《百家姓》列举的姓是堆砌在一起的,缺乏意义关联。由于篇幅短小(王相笺注的《百家姓考略》正文只有472个字)、整齐押韵,且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百家姓》“成了一整套启蒙识字教材”^{[6](P26)},而且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所以《百家姓》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中被广泛使用。如果我们以现代的识字教学理念为参照,比较《急就篇》和《百家姓》的话,就会发现《急就篇》体现的识字教学方法更好。《急就篇》中的姓固然没有《百家姓》中的多,但却出现在完整的名字中,构成了一个既简单又有文化意蕴的词语,儿童可以在学习词语的过程中识记词语中的字,这比单纯的死记硬背效果要好。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有意模仿《急就篇》,而且尽可能地将姓氏连缀成意义通畅的句子,但是在这些句子中,姓氏完全失去了生活语境,只是通过书名和注释,读者才知道这些字词代表各个姓氏。明代吴沆、刘仲质编写的《皇明千家姓》中收录的姓氏也被组成有一定意义的四言韵语,也有与《姓氏急就篇》一样的问题,而且抽象晦涩,并不易于儿童理解。

有学者指出,在1岁半到7岁的儿童言语活动中,“实词的发展自始至终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几乎在所有的年龄阶段,实词的比例都在90%左右”;“在实词中,以名词的比例为最高,其次是动词,再次是形容词”。^{[16](P100)}尽管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会说

的。“儿童早期所获得的名词都是意义具体的词语”,“这些词语所表示的都是儿童生活中所常见的人和事物”。^{[16](P105)}这些对儿童言语活动的研究,对理解《急就篇》的价值很有帮助,《急就篇》中收录的字非常符合儿童语言认知规律。

如果说姓名是人际交往中的常用名词,那么名物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名词。名物教育一直是中国蒙学教材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急就篇》中的名物教育占一半以上,言物的篇幅达到1120字。有学者对《急就篇》中的名物做过如下统计:

关于工具及日用器物的名词凡一百个,关于武器、车具、马具的名词凡七十个,关于衣履和饰物的名词凡一百二十五个,关于建筑物及室内陈设的名词凡五十二个,关于人体生理及疾病医药的名词凡一百四十个,关于农作物的名词凡三十六个,关于虫鱼鸟兽及六畜的名词凡七十七个。^[7]

《急就篇》密集地罗列名物,而名物都是由有意义的实词构成,内容简单直接,更有助于儿童在较短时间掌握大量名物知识,更好地展开进一步的学习。这与后来的《开蒙要训》以及一些杂字类蒙书十分相似。而在周兴嗣编写的《千字文》中,名物词语所占比例就没有这么高了。《千字文》还有南宋方逢辰编写的《名物蒙求》堆砌名物的语句比较少,而多是用描写、叙述的方式来介绍名物,将名物词语穿插在雅驯的韵语之中。《急就篇》引导儿童认识的世界,首先是客观的生活世界,然而才是伦理的生活世界;而在《千字文》《名物蒙求》中引导儿童认识的,首先是伦理的生活世界,然后才是客观的生活世界。戴表元在《急就篇注释补遗》“自序”中感叹:“古之君子,不以道废物,自一艺以上,苟有所益于人,虽农匠庖祝之贱,犹且亲为之。粤大圣人也莫不为,若黄帝之医药,虞舜之陶渔,夫子之牛羊会计,皆是物也……后之君子,平居悠然论古先王之道,若不足为,而问之以目睫之事,于其所服食,于其所居处,于其所游衍肄业,有日与之接而不知其名义者焉,岂不大惑耶?”(《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中,“犹且”写作“犹身”,“黄帝”写作“皇帝”,“肄业”写作“肄习”)随后又高度评价《急就篇》:“四民之业,百用之宜,靡不周兑。”^{[15](P142~143)}可见,戴表元对《急就篇》的识字理念是极为认同的。

《急就篇》中的名物多,且多为自然常识和生活常识,主要通过分类罗列的形式展现,能更好更快地让儿童认识周围的世界。《急就篇》中的名物种类包

括:织物衣饰、五谷蔬菜瓜果、服饰鞋履、金属器物、竹器、陶器、绳索、水生动物、家居用品和饰品、乐器和音乐、宴饮酒食、身体部位、兵器、车马、住宅、耕作、树木、六畜、鸟兽、疾病、医药、丧葬。其中,既有和普通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也有不常见的事物。这样可以激发儿童的兴趣,同时也可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急就篇》中的名物教育除了教育儿童认识周围的世界之外,也比较注重他们对自身的认识。《急就篇》的名物中包含60多个人体器官、40多种病名。汉代以后,这两种名物只在杂字类蒙书中出现,在官方认可的蒙学教材中消失了。在描述人体器官时,编写者遵循一定的顺序,从五官开始,由上到下依次展开。这种对人的身体器官的关注,具有实用性、常用性、易识记的特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人们在最初教幼儿说话和识字时都是从最基本的人体器官开始。从这个角度来看,《急就篇》在名物内容的选择上,无疑是考虑到了儿童的认知特点。《急就篇》还写了当时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疾病名和药名,同时还介绍了一些基本的医治疾病的方法,告诫孩童生病后不要讳疾忌医,应该寻医问药。这些内容都具有实用性。

即便是罗列诸物,《急就篇》的编写者也很注意字与字之间的意义关联。将名物的名称穿插到句意可通的七言句中,是常见的做法。总体来看,在罗列兵甲、车具、马具、疾病、药物以及身体部位时,意义比较通畅的句子相对少一些;而在其余部分,这样的句子是比较多的。由于句子的意义比较丰富,《急就篇》能够把一些生活知识融入其中,让儿童学习识字时更有兴趣。

分类识字也是《急就篇》在识字教学上的一个特点,这种方法在今天的识字教学中仍在使用。分类识字首先体现在名物的分类列举上,其次体现在文字的编排上。《急就篇》注意到汉字形义之间的关系,在分门别类介绍名物的同时,也让儿童很快掌握某一偏旁的汉字;把意义相近的字联系在一起,有助于联想记忆,这样有助于提高儿童认字的效率。

四、注重潜移默化的观念教育

《急就篇》也教儿童官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知识,从难易程度上看,这无疑是全书最难的部分。《急就篇》先教儿童认识自身和周围的世界,然后教其做人做事的道理,由易到难,逐步深入,这样,既教给儿童知识和道理,又保护了他们的兴趣,这种安排

符合儿童的天性和认知特点。

在蒙学教育中,识字教育与观念教育总是交融在一起的。而怎样对儿童进行观念教育,向儿童传递何种观念,则由蒙学教育的理念决定。沈元在批判程朱理学的蒙学教育观念时说:“他们真是战战兢兢,唯恐儿童不能长成封建等级制度之下的顺民,所以从小就要用‘格言至伦’给他们填塞,‘使盈耳充腹’,而这些伦理教条以外的知识都是‘谗说’,绝不可入。宋元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一些课本,如《三字经》《童蒙训》《圣谕广训》这些没有任何实际知识的、封建教条的汇编,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实践。”^[7]《急就篇》中有说教色彩的句子集中在“文学法理”部分,该部分要么鼓励儿童积极上进,要么要求儿童遵纪守法。

《急就篇》对各种社会价值观念兼容并蓄,强调最多的是遵纪守法,勿招灾祸。既有儒家的价值观念,也有黄老的价值观念,编者没有明确地偏向其中某一种。还能尊重比较落后的价值观念,比如对待鬼神的观念。“积学所致非鬼神”,是编写者价值观念的直接表达,是积极进步的,但编写者并没有以自己的进步批评别人的落后,而是客观地介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在进行思想观念教育时,《急就篇》主要采取潜移默化的形式,这一点符合儿童的认知特征。《急就篇》中抽象的道德词语很少,而且这些词语只是穿插在名物之中,如“贤良”“孝让”“忠信”等,不是以说教的形式呈现。延年益寿、去病避灾的美好愿望,也是通过名物列举间接呈现出来的,如“宋延年”“卫益寿”“周千秋”“邓万岁”“孔何伤”“所不侵”“痛无忌”等。如果从观念教育的方式来看,《急就篇》的指导思想更倾向于黄老之学:几乎没有关于道德标准的训诫,只是通过陈述不遵纪守法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提醒儿童必须注意行为规范。这与《千字文》中“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17](P10)}等训诫性表述有很大区别。在孝观念的传达上,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特点。孝这种价值观念是超越学派和时代的。虽然《老子》第18章中有“六亲不和,有孝慈”^{[18](P50)},《庄子·天运》中有“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19](P499)},但他们反对的只是人为的道德宣传和道德规范,并不反对自然的亲情。在《急就篇》之后,只要不是专门传授某一方面知识的蒙学教材,几乎都会明确地宣扬孝道。在《千字文》中,“资父事君,曰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

命”^{[17](P13~14)}“外受傅训,入奉母仪。诸姑伯叔,犹子比儿”^{[17](P17)}都与孝有关。《开蒙要训》中有“孝敬父母,承顺兄弟”^{[20](P177)}。至于《三字经》及以后的蒙学教材,就更不必说了。但是《急就篇》没有刻意宣扬孝的道德观念,这与西汉社会对孝的关注度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西汉时期,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推崇孝道,其表现有:“以孝作谥”“优待孝子”,把孝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诵读《孝经》”等。^[21]在《急就篇》中,“孝”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在“崔孝让”这个名字中;第二次出现在“宦学讽诗孝经论”中,指“孝经”,都不是以训诫的形式出现的。在教儿童认字时,如果有太多的训诫和道理,超出他们的认知能力,会适得其反。

作为一本封建社会的蒙学教材,《急就篇》不可能不表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急就篇》没有刻意地鼓吹封建等级制度,但是在名物列举中,等级差异被当作理所应当的客观事实呈现出来。如“妻妇聘嫁賁媵僮,奴婢私隶枕床杠”。结尾处说汉王朝地大物博,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四季风调雨顺:“汉地广大,无不包容。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穀孰成。贤圣并进,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颜师古说:“此为终篇,述帝德也。”^{[4](P318)}这一段共计63字,其中只有“大”“无”“盛”“边”“境”“百”“雨”“滋”“灾”“蝗”“穀”“复”“丁”13字在前文中没有出现,而“无”在此出现3次。这说明,这63字纯粹是为汉王朝唱赞歌,根本就不是为教儿童识字而编写的。这是《急就篇》的一大缺陷。

《急就篇》对后来的很多蒙学教材产生了影响。张志公在《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说道:“从《急就篇》下来,到了南北朝、隋唐,识字教材分成两路,一路以《千字文》领头,后来加上《三字经》《百家姓》,基本上为官府所承认,编法也比较雅驯;一路则主要流行在民间,宋代以下统称‘杂字’。”^{[6](P29)}无论是哪一类教材,都能看到《急就篇》的影响。比如《急就篇》将姓名纳入蒙学教育,对《百家姓》以及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中的名物教育观念影响更广。《急就篇》对日常生活知识的介绍,则可视作为后来的杂字类蒙书的源头。唐代以后,《急就篇》在蒙学教育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随着历史的积淀,好的蒙学教材越来越多,教材的教育功能越来越明确。而《急就篇》综合性太强,把姓氏、名物、观念教育杂糅到一起,而且名物种类还特别多。其次,唐代以后的蒙学教育越来越注重道德伦理教育,而《急就篇》的说教色彩不浓。最后,随着时代迁移,《急就篇》中的一些名物词语被新的名物词语所取代,失去了名物教育的意义。《急就篇》中收录的名物词语在唐代已经有了不同的名称,宋代大儒对这种名物也觉得陌生,更遑论后来的蒙童。虽然《急就篇》后来不再被当作蒙学教材使用,但其中的儿童教育观念影响深远。直到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一些儿童教育观念,如“分类识字”“潜移默化”等在《急就篇》中都能找到。这应该是它能够流传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张金光.论秦汉的学史教材[J].文史哲,2003(6).
- [2]张传官.谈《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J].辞书研究,2012(3).
- [3]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 [4]史游.急就篇[M].曾仲珊,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9.
- [5]陈垣.日知录校注(中)[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 [6]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7]沈元.《急就篇》研究[J].历史研究,1962(3).
- [8]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 [9]葛晓音.论汉魏三言体的发展及其与七言的关系[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 [10]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 [11]葛晓音.早期七言的体式特征和生成原理——兼论汉魏七言诗发展滞后的原因[J].中国社会科学,2007(3).
- [12]王筠.教童子法及其他三种[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13]陈黎明.《急就篇》用字初探[J].中国语文,1996(6).
- [14]黄兆宏.汉代人名的文化内涵[J].文史杂志,2014(3).
- [15]谢启昆.小学考[M].李文泽,等,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 [16]李宇明.儿童语言的发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17]周兴嗣,等.千字文[M].周艺,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7.
- [18]高亨.老子注译[M].华钟彦,校.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
- [19]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20]张新鹏.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21]赵克尧.论汉代以孝治天下[J].复旦学报,1992(3).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